

三 袁 诗 歌 初 探

李 健 章

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是以反对拟古的旧文风、提倡有个性的新文风作为旗帜，以解脱束缚、破除庸腐作为斗争任务，以独抒性灵、畅所欲言作为自己特色，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的。他们一面猛烈抨击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派，一面大胆地提出有创见的文学主张。袁宏道曾非常自豪地说：“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①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活动，就它的性质来说，是万历年间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趋向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要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公安派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创作个性化和自由化，从而体现它的真实性。按照他们的用语，则是要求“真声”、“真诗”和“各极其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在“真”和“变”的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两者间的关系，“真”是基础，是出发点，而“变”则是“真”的体现。他们反对作家说假话，作假诗、假文，反对摹拟、剽窃和套用陈词滥调，反对千篇一律浮泛不切的公式化、一般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他们对当时的拟古派进行了激烈攻击。且看袁宏道的两段诗句：

腹里少冶容，邯郸无高步。万耳同一聒，活佛不能度。摹拟成钝贼，士子递相误，臃骨蚁回旋，驴脊苍蝇聚。^②

当代无文字，闻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③

在第一段里，作者首先引用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这两个古老故事，说明生活实例告诉我们：离开本身的现实基础，完全被动地模仿别人，是从来不会成功的。他感叹当时文学界都是些有耳无目的瞎子，只知随声附和，不会自己观察森罗万象的现实，结果跟着复古派头目走上邪路，形成歪风。对于盲目追求形似的拟古逆流，作这样尖锐批判，可谓击中要害。在第二段里，作者一方面对由摹拟而来的假诗文作了彻底否定，而同时又对富有生活气息出自真情实感的民间歌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那才是真诗。他在一次给他大哥信中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他们明确地提出：作家要用自己眼睛观察现实，要撇开传统的老路，走民间文学的新路。这个观点，表现公安派在顺应历史潮流方面勇于革新的创造精神，很值得注意。

公安派所以特别推重民间歌曲，还因为它是劳人思妇的“真人”之作，与惯作虚伪的学士大夫不同。袁宏道说：“今闻闺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不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④这和以前作家为吸取艺术营养而学习民歌，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他们非常强调作家必须是具有高尚品质的“真人”，认为这是创作的先决条件，没有“真人”，也就不会有发自肺腑的“真声”和具

有鲜明个性的“真诗”。可见，他们所说的“真”，不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对作家生活道路和思想境界的严格要求。在这里，创作方法和作家世界观关系的问题，实际已经提了出来。这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项比较重要的发展。

这种所谓“真人”的“真声”，在他们自己诗作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既然要写“真诗”，那就必须说真话，在抒情的时候，敢于揭开自己内心的秘密，把那些并不光彩的东西如实地倾吐出来。例如袁宗道的《咏怀效白》：

人各有一适，汝性何独偏？爱闲亦爱官，
讳讥亦讳钱，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谁能兼？裴相岂不达，发白方壮年；北窗高卧人，垂老缺朝餐。良无丘壑贵，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难平，稊米宁不然！一毛附马体，安问缺与完。角者夺其齿，飞者不能潜；鹏飞不笑鸢，鸢行不爱蠶。尔莫信尔意，两粥拥衾眠。

这样暴露思想，是相当坦率的，用意不在“效白”，而是写自己的切身感受。如果检查一下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环境，就看出他说的全是真话，表达也比较充分。他二十七岁，会试进士第一，选为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子中允、右庶子，由宫廷词臣升为太子讲读的侍从官。在当时功名仕途上，这是一条利于飞黄腾达的道路。然而，他却生活在明代后期朝政极其腐朽的万历年间，而他所处的地位又碰上矛盾异常尖锐的政治漩涡。当时因“建储”（册立太子）、“建言”（议论朝政）问题而被停俸、降级、廷杖、罢官、流放，以及因此而遭到飞来横祸、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就在他中进士后几个月，与他同榜的黄安彭遵古和诸寿贤、顾允成三位新进士，因上书为海瑞鸣冤，而被“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事隔两年多，曾和他一道选为庶吉士的同年好友嘉鱼李沂，又因上书揭露太监张鲸罪行而受到廷杖，被打得死去活

来，勒令回家，斥为庶民。曾被李贽评为个性“稳实”的袁宗道，在诗中也经常流露这种内心的恐怖。如说：“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⑤“寒热穿骨髓，忧畏攻心魂，有似鱼入网，又类雉居樊”；⑥“踟蹰忽已久，未得一日欢”。⑦真能辞官回家过着“两粥拥衾眠”的生活吗？不行。首先是富贵难舍，同时，他的父亲是个官迷，家庭也不许可。在这样进退两难中，使他不得不以“真人”兼作“假人”。在入朝上班时，他是儒学文臣；出朝下班后，他和二三知己谈禅说道，俨然方外居士；而回到家里，便和妻妾儿女看经念佛，“香龕安佛像，贝典教妻儿”，⑧又是另外一种环境气氛。《咏怀效白》中所描写的，就是这种极其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异常矛盾的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从它的表面看，如所表现的富贵、贫贱、进退、生死等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的剧烈冲突，这类题材在古人诗中并不少见。但是，如果联系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从诗人这种自我剖析中，追究到做“真人”与作“假人”、封建枷锁与向往自由的矛盾，那就是这个历史时期创作上的新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所谓“真人”的“真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那就是对“真人”，说真话，表真情。这里可举袁中道的两首诗来说明。

湖上暂徘徊，明从此地回。今年君不死，
十月我还来。娱老书成蠹，绝交径有苔。忘机君已久，鸥鸟莫相猜！⑨

哀哀一孤鸿，飞急向东迈，伤哉金石交，
三载乃相会。相会能几何？一见不复双。子尚滞西陵，我遂往奎江。奎江不忍别，复有摄山行；摄山不忍别，逐子至冶城；冶城不忍别，十日淹江头，饮子清冷酒，卧子木兰舟。酸心一夜风，举目三千路，别矣可奈何？含泪入城去！⑩

这两首诗都是袁中道的早期作品，都是描写离别前的依依难舍之情，而所别之人又

都是与他情投意合最相知心的良师密友，当然也都是些最本色的“真人”。诗的表现方法，除前一首结尾两句和后一首开头两句外，全是直书其事，有时简直近于口语直说。然而，就在这些看来好象很平常的语句中，却蕴藏着极其真挚的关切之情，饱含着无限辛酸的生活之泪。

前一首，是在麻城别李贽而作。一五九〇年，李贽的《焚书》在麻城初次刻出，揭穿“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当时道学家的假面具，公开了他与有权势的耿定向在反虚伪和维护假道学之间的论战，因而受到封建帮伙的围攻和驱逐。旧友不敢接近他。他只好闭户读书，心情寂苦，迫害严重。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袁氏兄弟对他更加崇拜，曾先后到武昌和麻城龙湖，向他问学。他也很赏识这几个青年人，称为知己。而对于比自己小四十三岁的袁中道的豪爽性格，尤其赞许。袁有诗云：“我有弟兄皆慕道，君多任侠独怜予。”^①正说明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了解这些情况后，再读《别李龙潭》这首诗，理解就深得多。诗的开头两句，是写临别前夕，徘徊龙湖上而不忍去，表现了异常复杂的感情冲动。三四两句，表现作者对李贽的生命安全感到忧虑，心情沉重，难于措词。看来，只有用这种冲口而出的真情实话，才能达到安慰的目的。五六两句，描写李贽被孤立后的寂苦生活，但用主动的倔强语气出之，既是写实，也突出了他的性格。结尾借用一个典故，希望不要再对这位襟怀坦率的老人妄加攻击了。很明显，这首留别诗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离情别绪，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再看后一首，作者与之相别的丘长孺，原来是一位放荡不羁的才子，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还精通武艺。他与李贽和袁氏兄弟都有深厚友谊。袁中道在《书王伊辅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与故人丘长孺，还有其他朋友，都因怀才不遇，聚于武昌，“乃相携

分题赋诗，醉则起舞，登俳场，演新曲，一醉三月，兴尽，彼此各鸟散去。予乃与长孺买一舸东下，过浔阳，登采石，憩金陵，醉桃叶渡，走西湖，醉卧湖上，月余归。”这两个性格相近颇有才华的青年人，都因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压抑，遭到邻里和亲属的白眼，在家乡呆不下去，所以跑到外地过着自由放任的流浪生活。在这以后几年，他们还是依然故我，考试再次失败，心情更加抑郁愁苦，因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同病相怜的感情也与日俱增。《述别》这首诗，是袁中道暂寓真州期间，陪丘长孺重游金陵后，送他回麻城时写的。诗中连用三个“不忍别”，乍看似嫌过多地机械的重复，句调比较呆板。但如果说，现实主义的要求，主要是按照现实生活原来的样子进行描写，那他这种写法就非常得体，不仅具体地叙述了长途送行、难舍难分的整个过程，而且生动地表现了自己有家归不得的那种浪子的痛苦心情。通篇都是真情的吐露，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生活原样的如实描写，那就会贬低文学创作的意义，甚至失去艺术的特性。从前一些评论家对公安派的指责，说他们的缺点就在于“鄙俚”。这种批评并不确切。所谓“鄙俚”，主要是指诗歌语言的通俗化，而这正表明他们企图在创作上舍旧从新的一种大胆尝试。其实，这也只是和拟古诗的比较而言，他们的诗并没有真正脱离旧体，达到完全通俗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公安派的诗虽然描写了生活实况，说了真话，但在不少作品中，往往缺乏洗炼功夫，有缺少回味的平庸之感，这也是事实。例如袁宗道《死心和尚一朝弃诸生披剃书此赠》：

欲识新长老，便是袁中夫，
依然旧面孔，只少几茎须。
豪兴与颠毛，一斩一齐落。
独有爱山心，不受铜刀削。
袖中五色豪，落纸文光烨。

梦中莫与人，且留注贝叶！

第一首写的全是事实，说的都是真话，但除使读者发笑以外，能给人什么呢。下面两首，写出对方一些性格，比第一首好，可是也还浮在表面上，比较一般。这个缺点，他们自己也知道。袁中道就说中郎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远”。⑩这实际是指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以及语言锤炼的问题，他说得很确切。不过这不只是中郎的少年之作，而是公安派诗歌中比较常见的弱点。当然，他们有时也能自觉地加以克服，收到较好效果。这里可以举袁宏道和他哥哥同时写的同样题目《戏赠死心和尚死心以秀才出家》进行比较，就看出运用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时艺术加工的重要性。

铁城焰里热忙身，几人能掷头上巾？题将百八金刚子，辞却东家老圣人。少年意气非等闲，精悍之色在眉间，熔取鱼肠一匣水，铸作胡僧双耳环。往年湖上逢开士，藻月规烟说文炜，但知北海是大儿，谁识南宗印真子。海内学士闻行履，半说颠狂半惊死。东方先生代解嘲，秀字何妨竖却尾。瘦岩百尺突寒松，冰谷千年贮古水，落花红洗入溪澜，请看风吹起不起。诗中所描写的人物，原名袁文炜，字中夫，本是位有才能有个性出色秀才，他和李贽及袁氏兄弟都有较深交情，终因放荡不羁，饱受刺激，而决然出家。在这首诗中，有生活环境的描写，有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有旁观者的议论和表情作为衬托；在描写中，有直叙，有比兴，有夸张，有烘染，也开玩笑；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生动活泼。在公安派诗歌中，算是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完全不象袁宗道写的那样平淡乏味。通过这样对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着重描写生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这是文学创作，不能没有相应的艺术要求，否则就有滑向自然主义斜路的危险了。

我国古代文学，主要是在漫长的封建社

会中发展和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地主阶级和处于无权地位的农民阶级的矛盾。这一历史特点，就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上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表现，主要在于：描写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贪婪暴虐，揭露他们对广大人民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描写农民的疾苦，歌颂他们勤劳朴素的善良品质和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歌颂安定和统一，反对动乱与分裂；在男女婚姻关系上，歌颂真挚爱情，反对封建束缚，等等。此外，对中小地主阶级中穷愁失意的文人生活，描写他们的艰难遭遇，同情他们的困苦呻吟，也占了一定的地位。

在袁氏兄弟的诗集里，也有这类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在袁宏道诗中，又表现得更突出一些。例如：《逋赋谣》，反映苛征重赋给江南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江上见数渔舟为公卒所窘》二首，对被剥削被压迫的渔民表示深切同情；《猛虎行》和《竹枝词》其二，对四出抢劫无恶不作的矿监表示极大愤恨，反映了由于皇帝急迫搜括财富而造成全国深灾大患的历史事件；《丽阳驿题壁》，真实而生动地描写由于天灾与追交官赋而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荆州后苦雪引》，形象地刻画出贫富悬殊的两种生活的鲜明对比；《巷门歌》，谴责官府强迫穷人为富户守财防盗的不合理，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白铜儿》，描写一个金钱万能的典型人物，猛烈抨击当时卖官鬻爵制度；《拟作内词》八首，则更直接地从宫廷内部描写皇帝的荒淫腐朽生活。这些诗，从不同角度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并对它们作了大胆的比较深刻的批判，爱憎分明，笔锋相当锐利。然而，在他现存的一千六百多首诗中，所占的比例毕竟很小；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还没有完全超过他们以前的作家们所达到的水平。这不是他们诗作的主要倾向。

公安派诗歌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把重心放在通过写景抒情，表现个人精神世界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曲折，往往要从他们所描写的折光回影中寻根究底，才能看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例如袁宏道的《宿惠山僧房》二首：

小阁寒灰火，清香古佛颜。潮来吹雨叶，
云起叠山鬟。白衲随人指，青峰送客还。红尘
触处到，长日下幽关。

排遣何曾达，思惟亦是尘。病翻为乐果，
发在是愁因。松老皆成佛，花清亦避人。禅栖
如宴许，色色可怡神。

这两首诗，是一五九七年二月初作者游无锡惠山时写的。他在《游惠山记》里说：“山中僧房极精邃，周回曲折，窈若深洞。秋声阁远眺尤佳，眼目之昏瞶，心脾之困结，一时遣尽。流连阁中，信宿始去。”这就是他写这首诗时具体环境和身心感受的实录。第一首重点在纪实。前四句写秋声阁内外景物，刻画细致，对仗亦工。阁内幽静气氛和阁外的声色相配合，就把真境写活了。据《解脱集》，初稿原作“官与病皆去，无家也破颜，扣门多衲子，梦语亦湖山”，在艺术表现上就差得多。后四句是写他游山之事，因为厌恶红尘，所以回寺后，就整天关着门。第二首侧重言志，表述他暂隐这个狭小的佛阁中，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乐趣，吐露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在《解脱集》中，后四句原作：“竹粉遗天女，松脂食道人，南来休借问，即汝是前身。”就意境平直，远为逊色。从这两首前后的改稿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表现技巧上，也很重视精雕细刻。所以袁宏道说：“诗文之工，决非以草率得者”。⑬

这两首诗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作者力图避开世俗尘嚣，断绝烦恼，对山寺中自由自在的清静生活发生极大兴趣，恨不得出家做和尚才好。按照这种表现，如果不深入探索，而用简单分类和贴标签的方法，完全可以把它划到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坏诗中去，并且还

可说它由于有些艺术性，就愈有毒性，就更应排斥。与此相反，如果我们首先想到这位刚卸任知县的青年诗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常的情绪，作些历史性的调查，那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所间接反映出的社会政治问题，相当复杂而严重，不只是他个人进退的问题。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二十五岁中了进士，二十七岁这年十二月被任为苏州吴县知县。他预感到这官不好做，兴趣不高。所以他在次年二月出京赴任时写的诗说：“白马望吴门，惨淡无边际，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谜。”⑭他就抱着这种前途难料的“畏虎”心情，挨到三月间才到职，这时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六岁。苏州的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当时已相当发达，富庶甲于全国，因而也就成为统治阶级剥削的重点，加以地当交通要道，来往官吏极多，都要在这里捞点油水。在这样矛盾集中的地方，要做个比较清廉的官吏，就很难对付了。可是，这位初入仕途的青年袁知县，在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救灾荒，除积弊，判处案件果断明快，公事到手便办，显得很有才能。与此同时，他也饱尝了做官的苦味，感到他的个性完全不能适应，所以多次上书，坚决辞职。他把做官比作活地狱，象披着千重铁甲那样束缚人，象鸟和猴子关进笼子那样不得自由，又要装作各种假人，做出诸般丑态。他给丘长孺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不仅如此，做官还要承受良心的责备和冒着被陷害的风险。他给沈广乘的信中说：“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

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他看透了当时官场生活，根本没有是非可讲。因此，要做官，必须厚颜无耻，而要心安无愧，就不能做官；同样，要做官，就不可能自由自在，而要生活自由，只有辞官不干。这种矛盾冲突，在他离职前所写的两首诗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
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
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
蝼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
可以没余齿。千锺糲与糟，百城书若史。结庐
甌窳峰，系艇车台水。至理本无非，从心即为
是。岂不爱热官，思之烂熟尔。^⑮

碌碌复碌碌，浮生如转毂，帝宏匝地罗，
人窘弥天狱。堕地三十载，强半是蹙蹙，算喜无
十星，量愁有千斛。十五岁从前，师傅苦拘束，
朝愁日上春，暮愁书难读。十五岁从后，龟手
事场屋。儒巾才去头，官网又缠足。千晒得一
官，万晒得微禄。谁知微五斗，妻子转枵腹。
颜色低上官，肝肠枯案牍，举止动得过，憎患苦
相触。月不十回圆，酒无三朝熟。来者不可知，去
者不可赎。欲留色枯槁，欲归心彳亍。一病觉昨
非，万仞遂黄鹄。勿以径寸荣，易兹寻丈辱。^⑯
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前面分析过的袁宗道写的那首《咏怀效白》。他们兄弟都勇于揭示自己内心的矛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也好名、爱官、贪利，实践了他们主张做真人、说真话、写真诗的原则。所不同的，只是哥哥写得概括一些，说得比较含蓄，而弟弟则尽量作了真实的描绘。象“千晒得一官，万晒得微禄”，“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蝼蚁”这些极不体面的思想行为，也赤裸裸地和盘托出，而实际就是把自己作为典型来批判的。通过这样典型性的描写，确能反映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些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真实感，是现实主义新发展的一个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后一首《初度戏题》。这是作者离职前一个多月在十二月初六那天写的。这天

是他的生日，当时辞官没有批准，还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所以他认真回顾了过去近三十年的生活经历，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受着种种束缚，遭到百般折磨，生活极不自由。他热烈盼望能冲破这种“地罗”和“天狱”，象黄鹄那样自由飞翔于万仞之上。对于古代作家作品中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人理想，要具体分析它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如果是对社会政治不满，愤世嫉俗，或忧谗畏讥，或怀才不遇，在无可发泄之际，作超世出尘之想、那是古已有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可是，作为一个少年成名的进士，回想过去害怕读书，深恨被师傅拘束得不自由，象后来《红楼梦》中贾宝玉那样怕上学，那就是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问题了。要个性自由发展而轻视功名富贵，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可能由于这种思想矛盾不断折磨，害得他在任上连续病了五个月。久病，反而给他找到辞官的借口。一旦如愿以偿，病也好了，他象出笼之鸟，立即飞往无锡。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⑰就在这种心情下，他往游惠山。

现在再回头重读他写的《宿惠山僧房》二首，感受就不同了。这里，先对第一首“白帟随人指，青峰送客还”二句作点解释。这一联写得很自然，有点象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都是在朴素而幽美的境界中表现出诗人的心情和性格。他在写这诗前不久补作的游虎丘记中曾说：“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本来游人都在唱歌听曲，兴趣正浓，忽然戴着乌纱帽的县官吆喝而来，吓得大家都躲藏起来，的确是大煞风景。现在换上白帟便帽，消除了与游人的隔阂，连青山也似乎亲切相待。

这和作官时相比，诗人究竟是避开了现实，还是更为接近它呢？这是值得考虑的第一点；就诗人来说，作为一个小县官，根本无力对抗那种污浊现实。他给孙心易信中说：“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过丘积，眈眈虎视。”既然如此，是否要随波逐流，陷溺其中，才叫不逃避现实呢？这是值得考虑的又一点；再就这诗的基调来看，究竟是消极颓废，还是兴味盎然满有生趣？用佛理入诗，固然不好，但因写的是僧房环境，触景生情，亦很自然，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因此，如果不加分析地说它是消极的反现实主义的，按照形而上学固定的公式去硬套，那就会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李贽在《感慨平生》中说：“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⑩“三袁”中，两个弟弟“不愿属人管”的思想也很突出。袁宏道说：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他不作县令的原因之一，是不愿受上官管；怕上学，是不愿受师傅管。在前面举的《初度戏题》诗中，他说得极其明确。下面再看他三弟袁中道的一首诗，就表现得更生动，更充分。

日射柏林如膏沐，拜罢欲出不得出。长髯堂吏喝班散，黑头蛆子靴声战。出门掷去老头巾，独着短衣城外行，夺得健儿弓在手，一箭正中双飞禽。⑪

这位自负才华过人、颇有任侠之风的袁三，大哥夸他是兄弟中的“白眉”；二哥称他的学问“以自在为主”，写作诗文“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尽管他颇有名声，可是，在科举考试中却一再失败，一五九八年，他已二十九岁，两兄都以名进士在京城做官，他连举人也没考取。只好进太学读书。既入学，就要受学官堂吏管，他对此很不习惯。这首《太学偶作》，就是自己上学生活的真实描写。看，天气是那样好，拜见过学官就想溜走，可是学规不容许，熬到散班时，等那

长胡子老堂吏一声喊，这些太学生们就争先恐后地向外跑。他立即甩掉讨厌的儒巾，换上轻便的短装，跑到城外和健儿们射鸟打猎，过着另一种放荡生活。这类浪漫性的现实主义诗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封建束缚的厌恶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烈追求，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古代作家借乐府旧题描写的游侠儿，性质完全不同。

公安派把这种“不愿属人管”的自由思想引进他们的文学理论中，成为指导创作的重要原则。用他们所表述的语言来说，就是：“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根转”；“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人各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等等。总之，要求摆脱一切拘束，自由地充分表达个人的意志。这些原则，具体表现在创作实践上，首先就是反对拟古，反对剽窃，既不作古人奴仆，也不让当代所谓文坛巨子牵着鼻子走。这在前面已大致谈过。其次，由于他们极端厌恶世俗应酬的拘束，所以对自然景物特别喜爱。袁宏道和袁中道都有山水癖，好象一天不游山玩水就活不下去。贪图清闲自在，固然和他们的阶级性有关，但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企图在大自然中找到解放个性的自由天地。他们的想法，是借山水的自然之趣破除胸中郁积的烦恼。从他们在京城时所写的郊游诗中，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意向。例如：

花时晴色酿芳原，出郭犹如出槛猿。雾质风梢新柳绿，皱皮瘦骨老藤根。红云尾变知鱼热，碧缬纹繁觉水温。耳听碧流心翠岭，闲谈恰已到山门。⑫

觅寺休辞远，逢僧不厌多。一泓春水疾，十里柳风和。香雾迷车骑，花枝耀绮罗。半年尘土胃，涤浣赖清波。⑬

水亭箕坐两三人，湖面晶晶柳带新。夜色远来休道去，忍将白水换红尘。⑭

在他们诗中，多半是把自然界的景物描写得秀丽可观，饶有情致，给人一种清新自在的感觉。所谓为诗要师森罗万象，得自然之趣，实际是指诗人内在的纯朴之情寓于外界的自然之景，因而形成一种出于本然的无所拘束的自由境界，以弥补他们在现实生活难于实现的精神上的解放，含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袁宏道一再说他要“作世间大自在人”，就反映了这种迫切愿望。因此，如果一旦遇到适合的条件，它就会以各种不同形式强烈地喷发出来，象这类作品，在他们诗集中也有一些。例如：

一笑廓天笼，邀矣何空旷！千山如藻萍，点点白波上。世界无安置，虚空有等量，茫茫虱虱人，妍丑分何状。丘翟语曰知，舜吟禅为让。裨中闲是非，瓮里狂波浪。十年学贡高，一朝色沮丧。②

醉死便埋我，江山足万年。飞云环众岭，如月亘长川。大冶归西日，繁鳞入夜天。金陵千亿户，俯看一区烟。④

这两首诗的特点，都是由于登高望远，扩大了视野，放宽了心境，念宇宙之浩荡无穷，本极广阔自由，想到人生庸碌奔走，计较区区是非得失，殊属无谓，因而暂时解除思想束缚，获得精神自在。尽管它所描写的，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事物，但究其实际，则在于表现诗人幻觉中的自我解脱，偏重理想方面，应列入浪漫主义一类。在我国古代作家作品中，也有不少描写这种思想境界的，但有的感叹人生有限，不觉凄然泪下，有的故作旷达，想到及时行乐，都和公安派的追求精神自由有很大差别。

专就这两首诗来分析，虽然在主要方面有其共性，但它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感受和精神状态实际并不一样。前一首，是袁宏道辞去县官后，和好友陶望龄等畅游西湖，探禹穴，访兰亭，登上天目山的顶峰，在高瞻远瞩、心旷神怡中，作出了这首《浩歌》。后一首就完全不同。它是袁中道因落魄无聊，

和丘长孺同作漂流浪子，路过金陵，在苦中寻乐时写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艺术表现上就显出了差别：一个是开阔、明朗，一个是悲壮、沉郁。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分析具有浪漫主义性质的作品时，特别要注意发掘埋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从以上的初步分析中可以看出，袁氏兄弟在诗歌创作方面，虽然，成就并不太高，但确实表现了这个历史时期某些新的特点。其中有些迹象，可以看作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在十六世纪末期，文坛上出现以他们兄弟为首的公安派，有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决非偶然。

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久，地主阶级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统治制度以及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统治思想，这就决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必然是艰难曲折的。南宋的城市经济为孕育新萌芽所准备的条件，被元朝统治阶级摧毁了。从明初的恢复阶段到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又有较大发展，除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和少数城市商业的经营规模具有新萌芽的迹象以外，当时荆楚地区经济也有一次上升的阶段。

据袁中道记叙：“楚国号天府，自肃皇帝入继大统，实为汤沐邑，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⑤可是到了万历中期，又因王朝加紧剥削，矿监税监四出掠夺，“富贾困于税，皆弃故业；农夫亦为积逋所困，不复聊生”。⑥袁宏道在给沈伯函的信中，也提到当时沙市的盛衰变化，他说：“犹记少年过沙市时，嚣尘如沸，诸大商巨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绀锦如苇。不数年中，居民耗损、市肆寂寥。居者转而南亩，商者化为游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而当事者时欲取羡于额外，屡盈屡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很明显，这又使正孕育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遭受了挫折。但尽管如此，它

还是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来。

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和思想体系，所以只有从道家特别是佛教禅宗中借用一些所谓异端思想作为标新立异的手段。从南宋陆九渊到明代中期王守仁的所谓陆王派的理学，实际就是这回事。尽管他们的目的仍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也就有可能给离经叛道开方便之门。例如他们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九渊语）；“人心即神，人心即道”，“人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与天地同”（杨简语）；“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王守仁语）。既然如此，那么人人有心，也就应该人人可以自主了。重佛老，就必然削弱儒家正统思想的约束力。在当时知识界不断扩大的这一新动向，已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二月礼部奏：“近日士子，不用六经，甚取佛经、道藏，摘其语句为之，敲至此极”。同年六月，南京一个官员又奏：“近来士子，忘正雅而务剽窃，陋经传而尚佛老”。这种贩卖私货的玩意，在科举考试中也公然使用，以致礼部不得不采取复查已录取的试卷的严厉措施，追究责任，并在万历三十年六月所订的取士条例中正式规定：“参佛书者，罚斥”。这种行政命令，除了迫使考生作假文外，并无多大实效。而当时自由讲学的风气很盛，则更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袁氏兄弟完全接受这种时代思潮，并从李贽那里得到直接启示，而把儒、释、道糅合为一，从中取其所需。如佛家主张明心见性，认为即心即佛，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道家主张顺任自然，各适其性；儒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等。综合这些主观唯心论，就构成他们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公安派的贡献，就在于把这种思想和理论引用到文学创作方面，推陈出新，加以发挥，创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由于它的理论体

系中本来就含有和正统思想对立的成分，从而为摆脱传统束缚、为思想自由化和创作个性化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根据，表现了发展中的新趋向的先进性；同时，它又是当时社会思潮激荡运动的产物，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是在反对复古主义的斗争中，举起旗帜，登上文坛的，因此，又充分显示了这支新军的战斗性。对公安派的肯定，主要在这些方面。与此同时，也必须全面地看到这种理论基础的脆弱性和落后性，不仅在他们的文艺理论方面留下许多漏洞，而且使他们在创作实践方面受到很大局限，带来相当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在他们的诗中也有所反映，而在一些散文中就更为突出，不但说忠劝孝，甚至极力宣扬虚无主义、宿命论、因果报应、鬼神怪诞、封建迷信等等。这也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没有也决不可能和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脱离依存关系。对这些问题，也应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 ① 袁宏道：《答李元善》
- ② 袁宏道：《喜逢梅季豹》
- ③ 袁宏道：《答李子髯》
- ④ 袁宏道：《叙小修诗》
- ⑤ 袁宗道：《过黄河》
- ⑥ 袁宗道：《独坐》
- ⑦ 袁宗道：《咏怀》
- ⑧ 袁宗道：《偶成》
- ⑨ 袁中道：《别李龙潭》
- ⑩ 袁中道：《述别为吾友丘长孺》
- ⑪ 袁中道：《武昌坐李龙潭邸中赠答》
- ⑫ 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
- ⑬ 袁宏道：与黄平倩尺牍。
- ⑭ 袁宏道：《出燕别大哥三哥》
- ⑮ 袁宏道：《戏题斋壁》
- ⑯ 袁宏道：《初度戏题》
- ⑰ 与聂化南尺牍。
- ⑱ 《焚书》、《豫约》
- ⑲ 袁中道：《太学偶作》
- ⑳ 袁宏道：《游高梁桥》
- ㉑ 袁中道：《高梁桥》
- ㉒ 袁中道：《暮长安郊游》其二
- ㉓ 袁宏道：《浩歌登天目峰顶》
- ㉔ 袁中道：《携酒登清凉台》
- ㉕㉖ 袁中道：《赵大司马传略》。